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

马 雪 松^{a,b}

(吉林大学 a.行政学院; b.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长春 13001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社会也随之出现了社会利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具有凝聚改革共识与化解深层次性阻碍的作用,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及其均衡机制构建,有利于从历史进程和学理背景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价值意蕴与内在机理。通过考察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具体表现和现实背景,可以从政治权力及利益分配的双重逻辑分析失衡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 均衡机制; 现代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5) 01-0042-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社会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显,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面对这样的现实形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反映了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紧密结合在执政思路中的重要地位,表明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基本目标的定位不容动摇。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能够起到凝聚改革共识和化解深层次性阻碍的作用,但只有依靠相关机制才能更好地建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整体性格局。因此,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均衡机制构建的价值意蕴与内在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和基本保障,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实现途径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只有两者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得到满足、社会福祉整体增进。关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实现途径及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经济学、社会学、财政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分析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社会利益的均衡分配和资源的公平分享等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具体而言,经济学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集中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学关注转型期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侧重社会政策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财政学强调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财政吸纳能力对于社会成员均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支撑功能,通过完善财政制度尤其是转移支付手段消除地方财政收入差距中的不合理因素;公共管理学重视公共服务体系 and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机制建设,探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扩展和均等化水平提高的可行路径。

收稿日期: 2014-1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研究”(14CZZ036); 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13B001); 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整合式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研究”(2013B290)

作者简介: 马雪松(1982—),男,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

政治学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实现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自身特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侧重政治发展与政府能力、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国家结构与府际关系、政府职能建设及公共服务取向、社会利益集团对政策及利益分配的影响等等方面。值得强调的是,政治学虽然重视利益均衡对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意义,但其研究成果在两个方面蕴含深刻的洞见:一方面,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实现机制并不等同于利益均衡机制。利益分配和资源分享构成了共享的主要内容,但改革发展作为体制的重大转换过程和治理的完善巩固状态,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同领域、层面和环节之中,实现共享不仅需要利益均衡机制的必要功能,实际上还要求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机制、国家社会关系的协调机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机制、社会分化重组的稳定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而这些机制显然是利益均衡机制不能涵括的。另一方面,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并不限于利益的均衡层面。保证社会资源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中均衡分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利益冲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改革发展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强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所蕴含的均衡价值并非只是纠正已发生扭曲的社会利益分配结构,或缩小过分悬殊的区域、城乡、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而是通过机制建设实现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巩固的国家治理目标,让内涵丰富的改革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普惠共享。

对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而言,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进程和学理背景下才能充分、全面地揭示其内在机理和具体特点,因此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及其均衡机制的构建,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路径的角度,全面看待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容和目标,分析其如何决定或影响社会利益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分配过程和结果,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提供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考察维度。

现代国家的形态和特征尽管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都表现出显著差异,但从本质上看,“现代国家可以定义为一套由公共和职业化的人员组成的分门别类的政治机关,使中央集权通过政治关系覆盖特定的领土范围,并通过垄断规则的制定来垄断税收和武力”^[1]。现代国家建设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确立和巩固的持续性过程,国家权力向社

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微观领域不断渗透,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要求社会成员能够从现代国家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和社会良性发展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来源和支持性力量。“从根本上说,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同时又对公民负责的国家,如此人民才能享受持久的社会、经济繁荣,并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2]。然而,现代国家建设在满足人民需求、增进社会福祉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复合体,在协调利益差异的同时也要求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而市场作为要素交换和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求自身在法治结构中良性运行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一矛盾和冲突为国家调节社会并对市场进行干预赋予了某种合理性^[3]。如果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无法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并对市场实施有效治理,或者社会资源被片面地用于国家建设的某些部门领域,忽视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则极可能导致现代国家构建失败或公共政策执行失灵。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尽管存在内在联系,但两者在西方现代国家建设中大致上是历时出现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那里则表现出共时性和交叉性的特点。这使得当代转型国家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面临市场化建设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问题,又面临社会利益的平均分配可能导致市场机制发育不良的困境。

第二,从中国改革开放蕴含的现代国家建设逻辑的角度,可将政府、市场、社会的自身定位和相互关系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和目标中,揭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同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繁荣富强、民族独立复兴目标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国家追求现代化目标而进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结构性调整,其中不仅包含现代国家建设的合理性逻辑,而且体现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指向。邓小平阐释了现代化建设同人民利益的联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5],提出把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福祉增进当作判断改革成功的标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6]。现代国家建设涉及政

府、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三者的定位和关系非常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市场化改革取得突出成就,民主化、法治化却没有同速跟进;改革的区域发展战略、阶段任务执行、经济建设优先性导致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远大于居民收入增长,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甚至威胁社会稳定。在这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忽视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组织培育,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南美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多重变化似乎并未提高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出现和巩固的可能性,也未提高可有效减少这些社会中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7]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通过制度建设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确保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有力保证。对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来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进行更合理的利益分配,而且要从改革实践的逻辑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完善政府职能,培育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组织,实现现代国家建设主体关系的协调。另外,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还应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实践诉求,“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明确规定为,以追求社会公正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8]1055}。这意味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不但具有道德意蕴和伦理价值,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协调机制与稳定机制,同时还是构成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提供了整体性认识框架。

二、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表现、背景及根源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世界的比重均大幅降低,但国民福利在水平和范围方面的提高同经济增长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改革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普遍和均等地享有,这势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入推进改革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体现在诸多方面,并突出地表现为当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性,特别是表现为不断拉大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与行业差距。

第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区域差距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明显地表现出梯度发展形态。据2006年统计,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中部地区的2倍,并达到西部地区的2倍以上。从各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来看,西部与东部地区对国内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58.3%和37%,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内部要远高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9]。从省际差距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来看,这一数值由1978年的0.249降至1983年的0.217,但从1991年开始逐年波动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0.271,超过改革开放以前^[10]。

第二,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城乡差距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交通、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落差,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及质量在城乡之间也具有明显差异。2007年城乡收入名义差距为3.3:1,如结合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享用情况来看,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最高可达到6:1^[11]。

第三,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收入差距表现在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收入在社会范围内严重失衡。2002年调查数据显示,国内人均财产最多的20%人口拥有社会总财产的59.3%,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人口仅拥有社会总财产的2.8%,两者比率为21.18:1;如果将贫富人口的选取比例选定为10%的话,该比率将达到60.89:1。作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指标的基尼系数在1995年前后突破0.4的警戒线,并逐渐接近反映社会严重不平等的0.5的危险线^{[12]94}。

第四,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行业差距在社会群体因行业差异甚至行业内部因部门及单位差异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从1993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全国所有行业的基尼系数从0.166上升到0.218,实行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13]。据2010年统计,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83年的峰值56.5%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36.7%。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从改革开放启动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14]。

2. 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需要环境、资源的配合和支撑作用,历史条件、区域差异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等方面构成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具体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

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表现实际上深受现实背景的影响。

第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双重历史背景之下,不仅受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阻碍因素和既得利益的影响,而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还受到历史上官僚主导的政治体制、以小农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缺乏有效政治整合和自我组织的基层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一个社会发展有其自己的逻辑,而且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15]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既得利益遭受损失的旧势力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垄断性分利集团不可避免地会阻挠改革向纵深推进,传统体制中的消极因素也会降低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并给改革发展设置陷阱,这在客观上成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主要条件。

第二,中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与发展极不平衡的超大型社会,在此空间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采取任何改革措施必然面对发展成果如何公平分配的难题,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间的资源、利益、权利配置都无法脱离已有的区域差异格局。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在区域差异的前提下,“势必在有效治理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幅员辽阔意味着区域差异性巨大,体现中央意志的统一制度和政策治理的有效性难以符合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从中央抵达地方的治理层级链条较长,治理信息的传递难免发生阻碍和偏差,对基层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比较困难”^[16]。

第三,在看到改革开放极大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并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要注意这样的成就不仅脱胎于实行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植根于长达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社会,历史条件和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封闭性和不平衡,这对市场经济建设及其效果发挥产生了不利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自我封闭使我们落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体制的不平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7]。值得强调的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改革在全面推进过程中,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保证改革发展成果能够在高位经济水平上获得积累,还应注重破除经济领域中违背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权钱交

易对经济良性运行及资源、机会、权益合理配置的干扰。

第四,改革开放正式启动时的社会基础是存在严格城乡壁垒但内部未经分化的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长期受到体制和自身的双重压抑^[18]。改革开放在破解社会障碍、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动,新兴社会阶层、区域间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涌现,独生子女政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家庭关系及社会养老方式变革,社会领域存在大量制约改革发展的严重问题,改革进程不仅面临社会利益分化重组的干扰,而且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和不健全的利益协调能力导致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公正性和均衡性遭受挑战。

3.在分析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问题时,还要思考上述现实背景所蕴含的政治权力逻辑或利益分配逻辑作为制度根源是如何发挥消极作用的,这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改革全面深化并使发展成果被人民群众均衡享有。

改革取得成功是以制度建设的引导与巩固功能为前提和保证的。“国家建设的历史就是集中构筑这些国家权力的普遍性源泉,这些资源中的一部分正好植根于变化缓慢且相对不易为短期操纵所影响的制度性关系当中。”^[19]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在根本上需要以公共权力规范运行为基础与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调互动为内容的制度建设,而共享中不同程度的失衡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一方面,在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权力运行受传统计划经济和集中体制的惯性影响,加之市场经济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较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导致腐败行为、寻租活动的蔓延,因此一部分能够以权换钱和能够接近权力的人暴富起来。”^{[8]1040}这部分人或者利用自身职权将手中权力转变为私人利益,或者将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转化成为己所用的权力,通过俘获政府公职人员或影响政策目标设定“把改革议程扩大至超过可行范围之外”,使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公正价值的路线^[20]。此外,以公共权力滥用和社会价值失范为特点的社会性腐败“会导致收入不平衡程度不断加剧”,用于贿赂支出的资金增大了高、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本应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资源也会因寻租活动改变其用途,间接地扭曲政府的收入分配功能^[21]。另一方面,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不仅反映出政府再

分配能力不足,而且很大程度上同改革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有着直接联系。“生产决定分配,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对于产出的不同贡献决定的。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基础在于目前这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长期依赖对重要经济领域投入资本并重视土地资源开发,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比必然大幅提升,而且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大量资本,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拥有大片土地,“由此形成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却每况愈下的格局”^[8]¹¹⁷⁷。

三、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均衡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国家建设预期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发展型战略的顺利实施,政府应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获取充足社会资源并合理分配社会价值。在此过程中,改革发展成果被广大人民均衡地享有,有利于不同主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广泛凝聚的改革共识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在当前发展阶段,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需要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这四组关系。

1.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从根本上要求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以制度建设积极协调两者关系。市场经济建设所释放的社会活力及其创造的丰富社会产品构成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逻辑前提和物质基础,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可进行分配的充足的社会利益与资源。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下进行的,政府在引导市场发展的同时能否推动自身转型并实现善治,直接影响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效果。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第一要务是认识和评估市场经济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及提供物美价廉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约束”^[22]。市场机制不仅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回应,而且可以保证政府集中社会资源并将其投入到专门和必要的公共支出领域,这要求政府应确定不同公共

服务与福利保障的性质及种类。“现代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公共权威、规则和制定标准来提供服务,以部分替代早期所采用的公有制、公共补贴和直接提供服务等手段。”^[23]另外,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均衡普遍地享有,政府需要完善自身职能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调节社会利益集团间关系,消除局部市场无序状态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干扰。例如,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和道德体系,逐步实现规范化的市场秩序,减少以不正当手段操纵证券、信贷、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治理市场化经济社会转型中政府权力与资本勾结或政府受资本支配的问题,从而缩小社会分配格局中的各项差距。

2.在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方面,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要求以改革谋求实质性发展、以发展促进全面性改革,在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中,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均衡享有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中的利益、资源与机会。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能否享受以及享受到哪些成果是由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 and 实际效果决定的,因此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动力机制与阶段特点对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具有关键性影响。改革开放的稳健风格集中体现在逐步明确市场化方向、渐进推行及试点经验扩散、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非均衡发展路径等方面^[24],这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与安定有序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后发国家分阶段实现赶超型战略目标。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发展成果共享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改革发展自身的运作逻辑。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会促使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趋向接近,区域内居民收入及行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这也是发达国家之间以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发展和收入水平趋近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从非国有部门向国有部门、从条件成熟的试点领域向其他领域递进式扩散的特点,导致了各地区市场经济建设历程的非匀速化和内部发展的非均质性,现代市场机制促进资本、技术向后进地区和部门流动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改革由体制外起步向体制边缘推进并进入体制内部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针对体制内国有经济及实行垄断性经营的国有部门的存量改革成效有限,财政收入和政策资源向经济收益回报更高的领域持续倾斜。“谁走在前面,谁的经济就发展得快,收入水平也提高得快;谁走在后面,经

济就发展得慢,收入水平也偏低。”^{[8]1036-1037} 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必须消除制约改革深入推进的不利因素,凝聚改革共识并集中化解体制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难题,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全面协调发展,确保作为其成果的利益、资源与机会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均衡享有。

3.在增长与共享的关系方面,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有尊严地共享发展成果,在维护基本社会权利过程中推进内涵式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快速递增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较以往大幅增加,构成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前提和条件。经济如果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即使将国民财富的相当比例用于民生领域并基于平均主义分配社会利益,这样的均等化也仅是低水平意义上的均等化。但是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会自动地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也是不现实的,这不仅没有看到经济增长并不代表改革发展成果的全部内容,而且忽视了经济增长同社会成员的民生需求存在一定张力。“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公共需求的强劲增长相比,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仍然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公共产品短缺,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25]。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一方面应改变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土地开发型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劳动报酬增幅及总额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问题,要通过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国家开发战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协调共进来解决。另一方面应高度重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对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贫富差距表现为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不仅严重抑制了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而且在当前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乏力的情况下造成了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共享不足、贫富悬殊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挑战”^[26]。此外,广大人民群众均衡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是接受某种施舍,而是根据社会成员身份享受现代国家建设赋予的基本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权利”^{[12]169}。通过立法和社会政策保障社会成员享有基本社会权利并有尊严地共享发展成果,有

利于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之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从而将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建设和共同享用紧密结合起来。

4.在差异与平衡的关系方面,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构建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消除区域、城乡、收入、行业中的严重差距,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社会权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广泛覆盖和普遍受益。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现实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与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内容直接冲突,从国际经验来看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当部分的发展成果被既得利益集团攫取。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一方面应以平衡性措施消除同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相违背的体制性差异,如歧视性的城乡二元体制、绑定福利分配与身份限制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不同区域过程中效力不佳的衔接和整合体制造成财政能力悬殊,从而使转移支付难以弭平区域差距的财权事权划分机制等^[27]。另一方面,应认识到平衡性措施不是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结果平等,而是通过社会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确保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平等,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监管与各主体对权力运行体系的制约和监督确保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公正。在机会平等和过程公正的前提下,利益主体在共享结果上存在的合理差异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事实上,如果仅强调结果平等而忽视制度建设,很可能造成扭曲的公平和递减的效率,即“人们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实际收入,就不得不采取非经济手段,尽量扩大和行使自己的行政特权、行业特权和职业特权”^[28]。具体而言,政府应通过立法工作及配套机制建设,确立不分区域、不分城乡的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原则体系和实施框架;根据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确立全国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最低标准;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适应的政府间权力协调机制^[29]。

参考文献:

- [1] 维斯琳,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M].黄兆辉,廖志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60.
- [2] 马俊.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
- [3] 刘建军,陈超群.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

-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00.
-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3.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9.
- [7] 奥唐奈 吉.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 [8] 吴敬琏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 [9] 王志凯,史晋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及原因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6) .
- [10] 李猛.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分析[J].政治学研究 2011 (3) .
- [11] 安应民,等.构建均衡发展机制: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6.
- [12] 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9.
- [13] 周光辉,殷冬水.垄断经营:社会正义的困境——中国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问题的政治学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2 (2) .
- [14] 杨光斌.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J].行政论坛 2012 (3) .
- [15] 黄杰.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J].社会科学 2011 (10) .
- [16] 蔡禾.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J].开放时代, 2012 (2) .
- [17] 李义平.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J].读书 2012 , (2) .
- [18] 李峰.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的价值分析及实现路径[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4 (3) .
- [19] 埃文斯 彼 鲁施迈耶 迪 斯考克波 西.找回国家[M].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1.
- [20] 吴敬琏.比较:第5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51.
- [21] APERGIS , DINCER , PAY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 S. States [J]. Public Choice 2010 (1) .
- [22] 格伦内斯特 霍.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M].苗正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1.
- [23] 胡德 可,等.监管政府:节俭、优质与廉政体制设置[M].陈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
- [24] 郑有国.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与评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10) .
- [25]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基本公共服务与中国人类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08.
- [26] 张贤明,邵薪运.共享与正义:论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1) .
- [27] 古建芹,等.均等化理论与财政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140-141.
- [28] 郭冬乐,宋则.通向公平竞争之路:中国转轨期间市场秩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01.
- [29] 丁元竹.理解均等化[J].读书 2009 (11) .

[责任编辑:巩村磊]